

四編 南京大學特輯 II

北平淪陷時期散文研究

程天舒·著

民國文化與
文學研究文叢

李怡
沈衛威◎主編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文化
民國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叢文

四編 南京大學特輯

李怡 沈衛威 主編

第 11 冊

北平淪陷時期散文研究

程天舒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北平淪陷時期散文研究／程天舒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 103〕

目 2+130 面；19×26 公分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四編；第 11 冊)

ISBN 978-986-322-805-9 (精裝)

1. 散文 2. 中國文學 3. 文學評論

541.26208

103012906

特邀編委 (以姓氏筆畫為序)：

| | | |
|------|-----|-----|
| 丁 帆 | 王德威 | 宋如珊 |
| 岩佐昌暲 | 奚 密 | 張中良 |
| 張堂錡 | 張福貴 | 須文蔚 |
| 馮 鐵 | 劉秀美 | |

ISBN-978-986-322-805-9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四 編 第十一冊

ISBN：978-986-322-805-9

北平淪陷時期散文研究

作 者 程天舒

主 編 李怡 沈衛威

企 劃 四川大學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民國歷史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

總 編 輯 杜潔祥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初 版 2014 年 9 月

定 價 四編 12 冊 (精裝) 新台幣 2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北平淪陷時期散文研究

程天舒 著

作者簡介

程天舒，1983年生，江蘇崑山人。2012年6月畢業於南京大學文學院，獲文學博士學位。研究方向為周作人及淪陷區文學。2012年7月進入國家圖書館古籍部善本組工作。現為國家圖書館館員。

提 要

本文通過考察北平淪陷時期散文的基本面貌，清理這一特殊歷史時期散文創作的源流，描述新舊兩代作家建設現代散文文體的過程中，對古與今、東方與西方諸種文化資源的不同選擇，以及特殊政治環境下文體建設中蘊含的身份建構。

第一章旨在勾勒論題所處的文化場域的面貌，說明北平淪陷時期文化環境的特殊性，同時也強調其與戰前的連續性，並指出散文寫作在此間所處的位置。第二章以《朔風》、《中和》等刊物為對象，考察北平淪陷區散文與現代散文傳統的關係。掌故文章在「文」與「史」之間的搖擺，是與學術文章聯繫緊密的傳統筆記「現代化」轉型的體現。第三章考察《燕京文學》、《輔仁文苑》等校園文學刊物，以及以林棲為等人代表的校園作家，他們延續戰前「京派」塑造的何其芳「美文」傳統，還追摹英國 Essay 玄想之風，其創作可謂北京淪陷區散文一種可貴的嘗試。第四章主要考察淪陷區最重要的散文作家周作人。作為淪陷時期「華北唯一作家」，周的地位固然源自新文學運動以來積累的文學名望，但出任偽職後，「周作人」這個名字逐漸成為殖民統治的文化符碼。周作人以舊式筆記為媒介，由沉默到言說，調和個體言說與國民身份之間的矛盾。



目

次

| | |
|---------------------------|-----|
| 緒論 | 1 |
| 第一章 北平淪陷區散文寫作的語境 | 9 |
| 第一節 從「文化城」到「空城」 | 9 |
| 一、日偽當局的文化統制 | 14 |
| 二、日偽對北平作家的組織控制 | 18 |
| 第二節 作家群體及權力分佈 | 25 |
| 第三節 北平淪陷時期文學空間中的散文 | 31 |
| 第二章 小品文與筆記 | 35 |
| 第一節 去「幽默」化的小品文 | 35 |
| 第二節 《中和》與《古今》 | 40 |
| 第三節 沈啓無：從《近代散文抄》到《大學國文》 | 47 |
| 第三章 美文與 Essay | 55 |
| 第一節 北平淪陷時期校園散文概況 | 55 |
| 第二節 何其芳與露加斯 | 60 |
| 第三節 庭院中的幻想者 | 68 |
| 第四章 周作人：文章與思想 | 73 |
| 第一節 「一說便俗」 | 73 |
| 第二節 「思想家」周作人 | 83 |
| 結語 | 91 |
| 附錄一 北平淪陷時期出版的機構 | 93 |
| 附錄二 北平淪陷時期散文出版一覽表 | 99 |
| 附錄三 北平淪陷時期重要散文期刊與校園文學刊物目錄 | 103 |
| 參考文獻 | 113 |
| 附錄：周作人 1943 年在南方的演講 | 129 |

緒 論

本文通過考察北平淪陷區散文寫作的基本面貌，清理這一特殊歷史時期散文源流，描述新舊兩代作家建設現代散文文體的過程中，對古與今、東方與西方諸種文化資源的不同選擇，以及特殊政治環境下，文體建設中蘊含的身份建構〔註1〕。

由於特殊的政治屬性，淪陷區文學長期被打入另冊，是現代文學研究中最薄弱的一環，以北平為中心的華北淪陷區又是目前淪陷區文學研究中較弱的部分，因此，選擇淪陷時期與北平作為本文論述的時間與空間，首先希望豐富現代文學歷史圖景，使一部分被冷落的作家與作品，在文學史書寫中重獲其應有的位置。

現代文學史研究中，人為設置的三個十年的時間界限往往生硬地割斷文學事件內在的連續性，而依據政治屬性劃定的國統區、解放區、淪陷區的地域區分，更在共時的層次上進一步割裂文學環境的整體性，而淪陷區更被視作非我族類，隔絕於中國現代文學主潮之外。誠然，特殊的政治環境催生特殊的文學場域，淪陷區作家的寫作自有其特點。但即便激烈如「五四」也無法徹底斬斷新文化與傳統的聯繫，而政治軍事領域的劇變對文化思想又會有多大程度的影響？如果拋開意識形態偏見，正視淪陷區種種文化事相，即可明瞭身處國中異域的文化人，也希望抹去自身的「異類」色彩，而融入新舊文化傳統之中，求得安身立命之所。

〔註1〕1928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下令改北京為「北平」；淪陷後，偽臨時政府又於1938年改北平為「北京」。為求行文統一，本文論述涉及1938年之後的史事，仍使用「北平」這一稱謂。

另一方面，或因蘊含著傳統文化與古典寫作的巨大資源，散文是新文學中最快趨於成熟的文體，但也因此在新潮迭起的文壇屢遭指責。而三十年代的北平文人，在古典與現代間所做的豐富的文學探索，也面臨著革命文學的挑戰。當戰爭以一種殘酷的方式消解了左翼話語的壓力，日偽當局則大肆宣揚復古與東方文化，在這種存在巨大言說縫隙的畸形空間中，留居北平的散文作家又將如何拿捏尺度，在古今東西之間尋求現代散文的發展之道，他們的選擇與正在形成的新文學傳統又有多少聯繫，都是本文試圖解答的問題。

文學史的書寫自有其特殊的敘事體系，與非文學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的結盟乃其中一大特點。北平淪陷區各行政、教育機構都曾被打上「偽」的恥辱標記，光復後傅斯年對偽北京大學的師生採取的嚴厲甄別政策，十餘年後仍能引起當事人的申辯〔註2〕。儘管對文學與作家不能直接冠以「偽」字牌號，但「落水作家」「漢奸文學」卻是同樣嚴厲的指責。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以周作人、張資平為例，將他們稱作「為帝國主義者的」「漢奸文藝」〔註3〕，更為此後中國大陸對淪陷區文學與作家的定性一錘定音。

1949年以後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敘述中，抗日戰爭時期不同文學空間的文學史地位由其政治屬性決定，淪陷區文學往往被忽視或簡單帶過，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即是一例。直到1987年初版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淪陷區文學才得以在權威的文學史中佔據並非負面的位置。從1980年代開始，中國大陸學者就努力對文學史進行政治「祛魅」，淪陷區文學的研究也獲得了可能。1983年張毓茂的《要填補現代文學研究的空白——以淪陷時期的東北為例》，開啓了大陸地區淪陷區文學研究的先聲〔註4〕。1993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推出「淪陷區文學研究專號」，其意義不僅在於集中展示學界在這一研究領域的成果，更是對這一研究的學術肯定〔註5〕。而在1992年底啓動，錢理群、黃萬華、封世輝主持的《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以「文學大系」

〔註2〕參見梁實秋：《憶豈明老人·後記》，《傳記文學》（臺灣）第11卷第3期，1967年9月。

〔註3〕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5頁。

〔註4〕參見張毓茂：《要填補現代文學研究的空白——以淪陷時期的東北為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3年第4期。

〔註5〕參見《中國現代文學叢刊》1993年第1期。

這類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中別具文化政治意味的出版形態，也暗示了淪陷區文學的政治合法性得到初步承認〔註6〕。

但在淪陷區文學研究領域，研究者們面臨的首要問題仍是為自己的工作謀求政治與道德的合法性〔註7〕。正如黃萬華在《中國淪陷區文學研究資料總匯》的「前言」中指出的，填補現代文學研究空白的史料價值，是研究者為自己的工作與研究對象「正名」的最初嘗試。如《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的《例言》第一條就說：「為給中國淪陷區文學的教學與研究提供一套最基本的文學史料，特編輯本大系」〔註8〕。而對這套書系的正面評價也往往先從史料角度著眼，如同樣致力於淪陷區文學研究的張泉，稱其「為20世紀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史料建設畫上了圓滿的句號」〔註9〕。隨著「正名」的初步成功，研究空間有所拓展，開始對淪陷區文學的獨特景象進行理論化的剖析探討，鄉土文學、通俗文學、女性文學是其中最受關注的三種形態〔註10〕，這固然與淪陷區文學特殊性有某種程度的契合，但也可能因過於強調特性，而忽略了其他有意義的現象與話題。

淪陷區文學研究的一大特點是區域性，按大陸地區三大淪陷區劃分，東北淪陷區文學研究最早起步，以作家研究和鄉土文學研究為主，日本學者的積極參與是其另一特點，如山田敬三與呂元明主編的《中日戰爭與文學：中日現代文學的比較研究》，就是集合中日兩國學者，以東北淪陷區文學研究為主的早期研究成果；伴隨著「張愛玲熱」的興起，上海淪陷區與「孤島」的獨特文化背景也引起學界關注，由於「現代性」、「左翼」、「都市」等關鍵詞與諸種文化理論的恰當使用，上海淪陷區文學研究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有長足

〔註6〕這套書系的出版當然不是一帆風順，由正式策劃到最終面世，其間經過六年時間，這個時間跨度不僅因為史料搜尋的困難，也源於尋求出版中遭遇的困境，參見錢理群：《找回失落的文學世界——答〈南方文壇〉記者問》，《南方文壇》1999年第5期。

〔註7〕比如煞費苦心為淪陷區作家不能正面描寫抗戰題材尋找解釋，參見曲偉為《中國淪陷區文學研究資料彙編》寫的《總序》，彭放主編：《中國淪陷區文學研究資料彙編》，黑龍江出版社，2007年。

〔註8〕《例言》，封世輝編著：《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史料卷》，廣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頁。

〔註9〕張泉：《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史料建設的圓滿終結——〈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評價》，《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9年第3期。

〔註10〕參見黃萬華：《前言》，彭放主編：《中國淪陷區文學研究資料彙編》，黑龍江出版社，2007年。

的發展，如黃心村的《亂世書寫：張愛玲與淪陷時期上海文學及通俗文化》。另一方面，對上海淪陷區與「孤島」時期的文學史料也有較全面的發掘整理，如涂曉華的《〈女聲〉雜誌研究：上海淪陷時期婦女雜誌個案考察》〔註11〕，以及華東師範大學的一批博碩士論文。相對而言，華北淪陷區文學研究較為薄弱，整體研究以張泉的《淪陷時期北京文學八年》及《抗戰時期的華北文學》為代表。此外較多的是作家研究，比如袁犀、梅娘、吳興華。近年來則增加了對「漢奸」作家的關注，如周作人、沈啓無。一批年輕學人對周作人這一時期的散文寫作與思想變化有著「索隱」般的細緻解讀，如袁一丹的《知堂表彰禹稷臆說》〔註12〕，李雅娟的《淪陷時期的文章與思想——〈古今〉、〈藝文雜誌〉與周作人》〔註13〕。

臺灣地區劉心皇的《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是首部中文的淪陷區文學史，但作者的主旨是寫一部存史蹟、辨忠奸的現代「貳臣傳」，將淪陷區公開發表文字者，都判作「落水作家」。姑且不論道德教條的偏見，僅就以人為綱的寫作方式而言，固然提供了一些作家的生平資料，但難免忽略了文學作品的探討。因此本書的主要價值在史料層面，但材料中的謬誤與疏漏使得這一價值也十分有限。

美國學者耿德華(Edward Gunn)的 *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儘管與劉著同樣出版於1980年，但無論立意還是方法，都更具備優秀學術研究的基本素質。作者坦言無意討論「文學的社會作用或者作家們在道義上所處的窘境，而是要以批評家的眼光作出正確的評價，目的在於把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文學納入中國現代文學史和文學批評的主流中去。」〔註14〕以局外人的超脫立場，借助西方學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理論話語，以「浪漫主義」、「傳統主義」和「反傳統主義」為構架，對作家進行整體研究，側重分析各種體裁——尤其是戲劇與散文——的藝術構成。儘管在史料方面有所欠缺，西方學術話語和淪陷區文學實際狀況也難免脫節之處，但本書仍是目前最優秀的淪陷區文學史。

日本學者木山英雄的『北京苦住庵記：日中戰爭時代の周作人』，則是當

〔註11〕 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

〔註12〕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0年第1期。

〔註13〕 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

〔註14〕 〔美〕耿德華著，張泉譯：《被冷落的繆斯——中國淪陷區文學史（1937~1945）》，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頁。

下最重要的淪陷區作家個案研究。該書初版於 1978 年，又因材料的增加與作者本人研究的發展，於 2004 年再版時補充了注解與附錄論文。本書的寫作有著充足的情感動機，即回應周作人尋求中日之間理解之道的失敗嘗試，「試圖盡可能貼近他的立場而對事件的整個過程予以重構，以安慰那失敗的靈魂」，同時也明確意識到「作為日本公民而負有侵略戰爭之共同責任的立場」（註 15）。作者以「事件史」與「精神史」相結合的方法，加以日本學者擅長的考據工夫，對時代、國族、文化與個人之關係，做了綿密而深入的考索。

1994 年出版的張泉的《淪陷時期北京文學八年》，是大陸地區北平淪陷區文學研究的開拓之作。作為耿德華 *Unwelcome Muse* 的中譯者，張泉的部分論述與史料擇取明顯受耿著的影響，但相較於耿著，張著以廣泛的原始文本史料見長。是著出版時，尚處於為淪陷區文學正名階段，因此書中有相當篇幅用於駁斥謬見與偏見。2005 年，張泉又有《抗戰時期的華北文學》付梓，儘管題為「華北」，但論述仍以北平為主，立論也延續《淪陷時期北京文學八年》，不同之處在於史料的擴充與論述範圍的擴展。對於北平淪陷區的散文，張泉認為，這一時期的散文繁榮「虛有其表」，散文小品是初涉文學的青年們的首選，數量顯得較大；周作人的大名與作品頻頻出現在出版物上，造成散文繁榮的錯覺。「實際上，散文的水準和影響在當時都不很大，只是在華北文壇剛從死寂轉入復蘇期時曾一度較為突出。」散文「一度流行」的原因，一是報刊提倡散文小品，營造了寫作風氣，二是對初學寫作者來說，散文容易成文，對成熟作者而言，散文可以避開尖銳的社會政治現實。

除了一般淪陷區文學研究面臨的政治與道德難題（註 16），淪陷區散文研究還面臨著另一重困境，那就是中國現代散文研究本身的不足。比起其他文學體裁，現代散文研究依舊因襲著陳舊的文類劃分與價值判斷。1930 年代的左翼文學批評為散文研究話語奠定了基調，其影響綿延至今。目前優秀的散文研究多以個案為主，以文本分析見長，而整體研究較難擺脫成見，鮮有新意。這一現象很可能源於理論話語的缺失，西方學界很少專門的散文理論，

〔註 15〕〔日〕木山英雄：《致中文版讀者》，〔日〕木山英雄著，趙京華譯：《北京苦住庵記：日中戰爭時代的周作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年，第 1 頁。

〔註 16〕如俞元桂主編的《中國現代散文史》討論四十年代散文時，對淪陷區散文未置一詞。

中國學者也就少了一大借力，儘管也有學者嘗試自行建構專門的散文理論體系，但大多只是不堪推敲或毫不實用的空中樓閣。

相應地，淪陷區散文研究，往往只是將一般散文研究的預判與既成結論照搬到淪陷區，結合一些淪陷區的特殊現象，做一種簡單的加法。比如徐遵翔、黃萬華的《中國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根據地域和文類體裁分章敘述，沿用「知識小品」、「記述的小品文」、「論說的小品文」等分類，分析散文的文化形態與反抗意識。

謝茂松、葉彤與錢理群為《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散文卷》寫作的導言，能夠將淪陷區散文置於新文學傳統中，並對散文作品的文化與審美意義進行客觀的評價，也提及了北平與上海散文的風格差異。耿德華身為西方學者，避免了大陸文學史話語的拘束，將周作人、紀果庵、文載道並列，鮮明地指出了淪陷區散文對傳統的復興。這些研究成果中的重要結論，比如淪陷區散文重視個人的生命體驗，將日常生活納入審美視域，重新發現歷史、自然等，成為此後淪陷區散文研究的主要話題。

范衛東的《論抗戰時期中國散文創作中的自由精神（1937～1945）》〔註17〕，將抗戰視作文學階段，通過考察國族自由與個人自由之關係，分析散文作家的自由精神。認為淪陷區散文的價值主要體現在「政治壓抑下對生命自由的感悟和咂摸」，進而肯定淪陷區散文與國統區散文有相通之處〔註18〕。王鵬飛的《「孤島」時期文學期刊研究》〔註19〕，有專章討論「孤島」的特殊時空下，「西洋雜誌文」這一現代散文文體的新嘗試。對北平淪陷時期散文的專門研究，目前僅見曹鈴的《孤獨者的夜歌——論北平淪陷區校園散文的詩化傾向》〔註20〕，以北平淪陷時期的校園散文為研究對象，立論主要沿襲《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散文卷·導言》「詩化散文」的觀點。

本文首先睹勒論題所處的文化場域的面貌，說明北平淪陷時期文化環境的特殊性，同時也強調與戰前的連續性，並指出散文寫作在其間所處的位置。相較於1920年代末另一次文化人南遷，大規模國家戰爭造就了更加貧瘠的文化荒漠。但滯留北平者對這座城市仍保有「文化城」的想像。但實際上，此

〔註17〕 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

〔註18〕 范衛東：《論抗戰時期中國散文創作中的自由精神（1937～1945）》，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第16頁。

〔註19〕 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

〔註20〕 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

時的北平，無論是文化還是文學，都有政治化的傾向，非常態的社會政治環境導致文學場域的權力流動，造成不自然的文學群體分佈。儘管日本在侵華戰爭中特別重視思想宣傳與文化統制，對輿論宣傳與文化出版都有嚴格的控制。但其內部存在著政治權力的制衡與衝突，不同的權力集團也影響著北平文壇的權力與資源分佈。由文學報國會三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與兩次大東亞文學獎，是官方對文學進行政治規誡的集中體現，更昭示著各種文體在政治化的文壇喪失獨立文學品格的危險。

第二章首先以北平淪陷後出現的第一種散文刊物《朔風》為對象，考察北平淪陷區散文與現代散文傳統的關係。面對讀者來信建議提倡幽默時，《朔風》編者明確表示拒絕，不僅是意識到此舉不合時宜，也延續了「京派」對小品文幽默風格的審美判斷，《朔風》為代表的散文可謂是「去幽默化」的小品文。而中國傳統筆記也未另一批作家提供了學術文與掌故筆記這兩種表達方式。在周作人轉向筆記尋求散文資源的同時，淪陷時期北平的報刊中也盛行著另一種筆記——掌故文章，民國掌故大家瞿兌之與徐一士編輯的《中和》，是此時北平文壇一種最重要的掌故刊物，不過，與滬上的文史半月刊《古今》相比，《中和》具有更濃重的學術氣質，掌故文章在「文」與「史」之間的搖擺，是與學術文字聯繫緊密的傳統筆記「現代化」轉型中的必經的歷程。作為「苦雨齋弟子」中資歷最淺者，沈啓無的文學名望源自《近代散文抄》，此書的編選與出版完全依附於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淪陷後，沈啓無首先依靠周作人謀取偽北大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系主任的職務，並以偽北大文學院集合了一群年輕作家，與日本文學報國會與華北作家協會合作，希冀獲取更大的文化權力，《大學國文》的編選，是沈啓無試圖脫離周作人建立的現代散文觀的嘗試，但他此時的文學觀念仍然不能超越周作人在淪陷後建立的文學話語。

第三章首先考察《燕京文學》與《輔仁文苑》等校園文學刊物。燕京、輔仁兩校因其教會背景，得以成為淪陷時期北平的「孤島」，在其蔭蔽之下的校園作家，相較於大多具備官方身份的「既成作家」，擁有較大的創作自由，也有著更加旺盛的創造力，在文學創作之外，還有大量譯作與文學批評。他們承襲戰前「京派」中人學院派純正嚴肅的文學觀念，散文創作，不僅延續戰前「京派」塑造的何其芳「美文」這一新傳統，還追摹英國 Essay。戰前即開始文學創作，可算「京派」青年作家的林棲，在淪陷時期的散文創作兼具

英國 Essay 玄想之風與中國小品精緻之美，是現代散文中一種可貴的嘗試。

第四章主要考察淪陷區最重要的散文作家周作人。作為淪陷時期「華北唯一作家」，周作人以舊式筆記為媒介，經由沉默過渡到言說，以克服散文家的個體言說與國民身份。他的巨大聲望固然源自新文學運動以來積累的文學名望與資本，但隨著出任偽職，他的名字卻成了殖民統治的文化符碼。1943年4月，周作人赴南京就任偽國府委員，游蘇州而未至上海，寧滬兩地的朝野文人彙集迎迓，堪稱淪陷區文壇「盛事」。詳細考索這一事件中各方言行與事後追述，不僅有助於清理當時南北文壇的複雜關係，也可借助滬上文壇的北平「想像」，從另一角度解讀北平淪陷前的文化面貌。與此同時，周作人被滬上文壇塑造為「思想家」，強調「思想」或可補現代散文之闕，但淪陷區特殊語境下的「思想」卻包含了太多政治意味。

第一章 北平淪陷區散文寫作的語境

第一節 從「文化城」到「空城」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北平曾彙集中國新文學草創期最重要的作家與知識人。但隨著政治革命的生成與現代化文學生產的展開，1920年代中期以後，北方的新文化陣營開始南遷，上海成為中國現代文學中另一個重要場域，且因其「革命文學」的政治合法性，在後世的文學史論述中，常凌駕於北平之上〔註1〕。1930年代初期，北平的文人群體發生新的聚合〔註2〕，以文學刊物的編發為基礎，生成了獨特的文學理念與創作形態。1933年10月，沈從文的《文學者的態度》引發了平滬兩地作家的論爭，「京派」也在與「海派」的對話中生成，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重要的文學群體與創作現象之一。魯迅在《「京派」與「海派」》中諷「京派」為官的幫閒，但自國民政府南遷，空有歷史陳跡的「帝都」實際無官可幫，1930年代的北平早已享有「文化城」的名號，「京派」的主體實際就是「北平的學者文人們」〔註3〕。

〔註1〕 1949年以後，中國現代文學史本身就是一種左翼話語，左翼文學自然在其中占絕對的主導地位。政治控制鬆動後，現代文學研究者構建三十年代文學史時，「左翼文學」仍是不可或缺的「現代文學主潮」，如曠新年的《1928：革命文學》，對上海地區文學活動的論述就遠遠超過對「京派」的考察。

〔註2〕 對於這一聚合過程，高恆文在《京派文人：學院派的風采》的第一、二章中有詳盡論述。

〔註3〕 魯迅：《「京派」與「海派」》，《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492頁。

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北平彙集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燕京大學等著名學府，吸引著全國各地的現代知識精英與青年學生。以 1932 年國民政府教育部的統計為例，該年度北平共有專科以上在校學生 12221 人，占全國總數的 28.6%〔註 4〕；不僅如此，1932 年的北平人口數為 1500231，每萬人中就有大學生 81 人〔註 5〕，而此時全國平均每萬人中僅有大學生 1 人〔註 6〕，北平城的「文化比重」由此可見一斑。由大學校園與眾多學術研究團體構成的學院空間，與北平的文學空間相重疊，形成了以大學師生為文學主體的文化城。對 1930 年代的文學史描述中，「京派」往往佔據重要的一支，而北平不僅是「京派」的背景，在「京派」文學圖景中更有其獨立的美學品格。偌大的北平固然有著豐富的面相，已有論者試圖從不同角度描述古城的激進面貌〔註 7〕，但對左翼青年與革命文學的文學史敘述，其價值更多的是「補史之闕」，「文化」與「古城」仍是描述北平時最常用的標籤〔註 8〕。

盧溝橋事變後，宋哲元於 7 月 28 日離開北平，二十九軍也於次日全面撤退，日軍由此進佔北平。7 月 30 日，日軍組織成立北平治安維持會，由江朝宗任會長。8 月 6 日，偽北平市政府成立，仍由江朝宗任市長。8 月 26 日，張自忠轄下的國民黨第七集團軍與日軍鏖戰半月後，終因孤立無援而撤退。8 月 27 日，日軍扶植的偽華北人民自治會成立，王克敏任會長。12 月 14 日，與日軍攻佔南京遙相呼應，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北平成立。12 月 24 日，由華北方面軍特務部策劃的偽中華民國新民會成立。不到半年時間，日本軍隊

〔註 4〕 參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二十一年度全國高等教育概況》，1934 年，教育部編纂：《二十一年度全國高等教育統計》，商務印書館，1935 年。北平專科以上在校學生總數及所佔全國人數百分比，為本人依據這兩種統計計算而得。

〔註 5〕 1932 年北平人口總數參見《北平市民國元年來戶口統計表》，北平市政府公安局編：《北平市政府公安局戶口統計》，1936 年，第 1 頁。北平每萬人中大學生人數為本人計算數據。

〔註 6〕 參見教育部編纂：《二十一年度全國高等教育統計》，商務印書館，1935 年，第 2 頁。

〔註 7〕 參見馬俊江：《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北平小報與故都革命文藝青年——以〈覺今日報·文藝地帶〉為線索的歷史考察》，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 年。

〔註 8〕 1936 年，《宇宙風》第 19 至 21 期刊載三輯「北平特輯」，並以此為基礎選輯出版了《北平一顧》，內中文章大致可以代表 1930 年代文化界對北平城市形象的體認。當代學者對民國北平的考察也以「文化」為最主要的關鍵詞，可參看趙園：《北京：城與人》，高恆文：《京派文人：學院派的風采》，季劍青：《三十年代北平的文化生產》，陳平原、王德威主編：《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

在北平的殖民統治已初步成型。至此，「一個女神王后般美麗尊嚴的城市，在蹂躪侮辱之下，懨然地死去了。」〔註9〕

不過，「九一八事變」後，儘管中日雙方在華北摩擦不斷，但總能通過談判暫時緩和危機，因此，盧溝橋事變初起時，身處北平的學院中人與一般市民一樣，大多抱有和平解決事端的希望。即便是地處城外，形勢相對更危險的清華大學，其教務長潘光旦、秘書長沈履，也於7月10日向身在上海的校長梅貽琦發去電報，稱「連日市民、學校均鎮靜，各方安，乞釋念。」〔註10〕像聞一多那樣早早攜家人離平者〔註11〕，尚屬少數。直到7月29日日本軍隊進駐北平後，文化人才開始大批撤離，如8月12日一天之內，就有沈從文、楊振聲、梅貽琦、葉公超、周培源、朱光潛、錢端升、張奚若、梁宗岱等北大、清華教授結伴離平〔註12〕。

9月10日，國民政府正式發出第16696號令，決定以北平大學、師範大學、北洋工學院、北平研究院等院校與學術機構為基幹組成西安臨時大學；以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為基幹，組成長沙臨時大學。北平的國立大專院校開始正式南遷，滯留北平的大學師生也隨之大量撤離，如潘光旦與陳福田、沈履等清華教授，於9月16日啓程離京。11月，北大的鄭天挺、羅常培、魏建功等離京南下。此外，由於戰事爆發時正值暑假，許多返鄉度假的學生也放棄回平，直接轉往其他學校借讀，如燕京大學本科生張芝聯，盧溝橋事變後從上海轉往武漢大學借讀，因武漢大學內遷又返回上海光華大學完成本科學業〔註13〕。國民政府要求助教以上隨校搬遷，因此除了隨校遷移的師生，也有教員脫離學校單獨離平，如廢名因講師身份未能隨北大一同撤退，曾一度寄居喇嘛廟，1937年11月返回湖北黃梅老家。到1937年年底，北平有聲望的新文學作家僅剩周作人與俞平伯，「京派」的主幹份子也只留下

〔註9〕冰心：《默廬試筆》，卓如編：《冰心全集》第3卷，海峽文藝出版社，1994年，第171頁。

〔註10〕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3卷（上），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頁。

〔註11〕聞一多於7月19日離平南下，參見聞黎明、侯菊坤編：《聞一多年譜長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01頁。

〔註12〕參見吳世勇編：《沈從文年譜》，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194頁。常風在抗戰勝利後寫作的文章中回憶了8月12日當天去車站送行的場景。參見常風：《一個知識階級的心理演變》，《大公報·文藝》，1945年12月16日。

〔註13〕參見張芝聯：《五十五年前的一次嘗試》，《讀書》1995年第12期。